

004195

ERYUAN GEMINGGENJUDI

CAIZHENGZHI

鄂  
豫  
皖  
革命根据地  
财政志



鄂 豫 皖

革命根据地

# 财政志

徐向前  
一九八四年十月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前 言

这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志》是鄂、豫、皖三省财政战线上一些同志共同努力的硕果。

从一九八二年起，黄冈地区财政局、税务局遵照省财政厅、税务局的安排，并且得到河南、安徽两省财政、税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着手组织专门班子搜集史料，才编写了这本志书，历时四载，五易其稿，现在与读者见面了。此时此刻，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在资治、教化、存史方面为社会主义的财政建设作出微薄的贡献。

这本财政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曾经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许多老同志的热情支持。一九八四年，原武汉军区顾问吴昌炽同志看到本书送审稿后十分重视，并向徐向前同志作了汇报，徐帅对此书极为关怀，不仅提出了宝贵意见，而且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原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述申同志，原国务院财政部部长吴波同志也先后对本书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题了词。原国防部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刘少卿和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沈振东二同志也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吴昌炽同志秉承徐帅指示，更为关切，不仅亲自过问，而且多次嘱咐我要进一步把这项工作抓好。

为了切实做好书稿的修改工作，一九八五年九月下旬，我们和湖北省财政厅的负责同志在红安县主持召开了一次评审会议，除了鄂、豫、皖三省以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地、市、县财政、税务部门有关人员外，还邀请了一些专家、教授、学者参加，对

本书第三稿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评审。并根据评审意见，一方面进一步甄别、挖掘史料；另一方面着手进行修改，到今年四月写成第四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于七、八月间组织了几位对财政、修志工作有所研究的同志，再次集中审阅，并在一些章节上作了调整和修改，最后定稿。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志》，是以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战争为主线，展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济斗争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过程。它用大量史实反映了经济斗争与革命战争的关系，记录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根据地的党和苏维埃领导群众和工农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而且在经济战线上采取各种措施敛财聚物，粉碎敌人经济封锁，支持武装割据的动人业绩。尽管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是战时财政，一切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但同时在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兴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方面，也作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原则和作法，对于今天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财政工作，仍然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的。由于我们在修志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缺乏经验，不当之处，敬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原世泽

一九八六年八月

## 凡 例

一、本志分为五章二十节。卷首有题词、地图、照片、前言、凡例、目录，以概述开篇，总摄全书；卷尾有“大事记”作为研究财政税收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参考，以及了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始末；有“史料附录”以印证本志史实的可靠性；有“后记”说明本志编写的指导思想、方法、体例及其全过程。

二、本志按章、节、目、项四个级次分档。“章”、“节”设眉题；“目”的标码用汉字一、二、三、……；“项”的标码用汉字（一）、（二）、（三）……。在个别章节中，“项”以下也有“分项”。“分项”这一级的标码用阿拉伯数字1、2、3，再往下则为（1）、（2）、（3）和①、②、③。

三、本志所记载的史实，因处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情多在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为了便于读者考查它的来源和出处，均在页末加上“脚注”。

四、部分章节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章节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五、“财税英烈”，除省（特区）级财政、税务主要领导人外，均按卒年和姓氏笔划排列。

六、本志度量衡单位和币制单位，因当时各地不尽一致，无法统一折合计算，均依原文照录。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史料时按原文录用，保持历史原貌。对有明显错漏之处，则分别用以下不同符号予以改正：改错在错字后用“（ ）”，删去错字用“〈〉”，补字用“[ ]”，缺字用“□”。

八、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断限时间，上起一九二七年八月，下迄一九三七年七月。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必须说明的问题，则适当上溯和下延。

九、本志通篇以文字叙述为主，并相应地运用图表和照片。

十、为了遵循一般行文规定，在引用原文时，均将字号冠在前面，如“第几号文件”，但在“脚注”内仍保持原貌。如“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通令第十五号”，其余类推。

## 概 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它包括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sup>①</sup>、麻城、黄陂、孝感、黄冈、罗田、英山（当时属安徽）、浠水、蕲春、黄梅、广济；河南省东南部的信阳、光山、罗山、商城、固始、潢川、息县；安徽省西部的六安、霍山、霍丘、潜山、寿县、太湖、宿松等二十几个县的广大区域<sup>②</sup>。这个地区南襟长江，北带淮水，西扼京汉铁路<sup>③</sup>，威逼九省通衢武汉；东控江淮平原，震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心脏南京。大别山脉雄峙其间，山川交错，湖泊棋布，为历代兵家逐鹿中原必争之地，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之南与中央根据地隔江相望，西与湘鄂西根据地紧密相连，鼎足三立，对蒋家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块根据地就成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入重兵反复“围剿”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个地区是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区。据一九三〇年统计，鄂豫边除黄冈、黄陂南部外，五百户以上的城镇不满二十

① 黄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攻克黄安县城，改为“红安”，时间不久，又沦于敌手，仍称“黄安”。建国后，于一九五二年经政务院批准又改为“红安”。按当时历史文中仍称“黄安”。

②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其中包括建国后新划的县，如湖北的大悟、新洲；河南的新县；安徽的金寨、岳西等县。

③ 京汉铁路：即“平汉铁路”。一九三〇年改北京为“北平”，故称“平汉铁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又恢复原名——京汉铁路。武汉大桥建成后，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在一起，则称京广铁路。

个①，既没有大的商埠，也没有大的工业生产单位，工业产品极少，商业也不发达。农业品以谷麦、棉花为大宗，其余为杂粮（豆子，高粱）、蚕丝、茶叶以及竹、木等。当时，鄂东北的麻城、黄冈、黄陂南部虽然有些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但都十分脆弱；豫南的商城出煤，由于手工开采，产量微乎其微②；皖西的六安、霍丘等县算是一个出产比较丰富的地方，输出的也只是些大米、棉花、茶、麻、茯苓、竹木、纸、黄丝、木梓油等农副土特产品；在贸易方面，安徽边境的麻埠虽然比较活跃，但是，由于交通不发达，单靠肩挑背驮，交易也极其有限③。

同旧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鄂豫皖边区经济十分贫困，加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人民生活极其艰苦。农村约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一般占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英山县蔡家畈村的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竟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八，而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贫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土地④。鄂豫边界特区北部一带，甚至还未完全脱离农奴制度⑤。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往往占全部收成的一半或一半以上。有些地主为了索取更多的地租，采取“泡田交佃”的办法，将一石田作为一石五斗交给佃户耕种，然后按此收租。麻城的地租，“名义是对分，实际上田主硬得三分之二”⑥。豪绅地主还乘机进行高利盘剥，“以每元每月三分或四分的利息借给农民，以后又复利计算”⑦。其中最厉害的是“猴

---

① 《鄂豫边特委报告——边字第一号》，1930年1月10日。

②⑤ 《鄂豫边给中央的报告（节录）》，1931年1月8日。

③ 《皖西北特苏给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报告》，1931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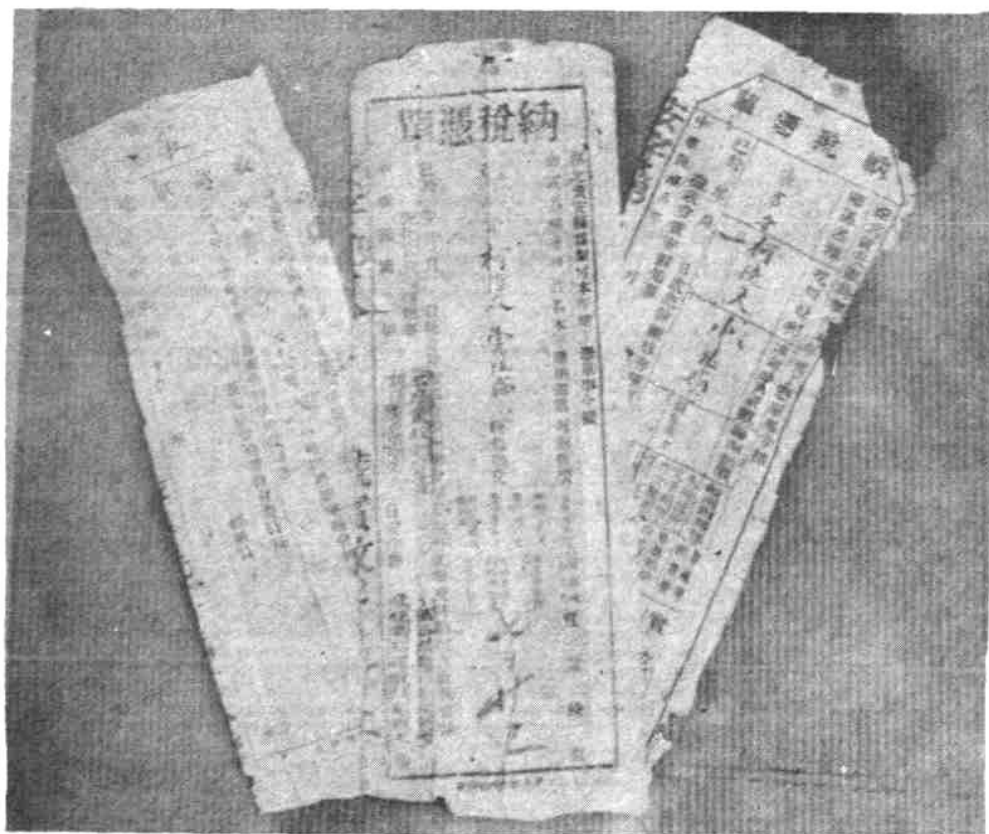
④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

⑥ 《中共麻城县委报告》，1929年5月。

⑦ 《霍山县委工作报告》，1930年4月17日。



子蹦”，即月初借一元，月底还二元；当月还不了，第二月还四元<sup>①</sup>。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有田亩捐、人头捐、门牌捐、灶头捐、民团捐、“剿共”捐、买枪捐、草鞋捐、入会捐、烟酒税、屠宰税等共数十余种<sup>②</sup>，



此图是黄安县农民柯德太一家两代向国民党政府交纳捐税的部分收据。

① 《大悟县历史简编》。

② 《鄂豫边给中央的报告(节录)》1931年1月8日。

加上军阀混战，李老末<sup>①</sup>等土匪到处奸淫虏掠，以致民不聊生。更有水旱虫灾，连年为害。一九二八年，皖省大水，而鄂豫两省又遭大旱。豫省“旱灾亘古未有，自春至秋，滴水未降，豫南所属，秋收全无。”一九二九年，豫皖两省大旱，鄂豫皖又同遭虫害。一九三〇年，豫遭水灾，“豫东二十余县，尽成泽国”<sup>②</sup>。一九三一年，鄂豫皖三省遭受百年未有的特大洪灾，沿江河平原一片汪洋。天灾人祸，使鄂豫皖边区的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广大人民日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鄂豫皖边区人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以求生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董必武、陈潭秋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即派人到鄂东建立了党的组织。到一九二七年，先后建立党组织的有：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黄梅等县；河南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罗山等县；安徽的寿县、六安、霍山、霍丘等县。这些地方党组织建立起来以后，就积极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使农民革命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边区人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鄂东北黄（安）麻（城）地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鄂豫皖边区土地革命的伟大序幕。接着，豫东南人民举行了商（城）南起义（又称立夏节起义），皖西人民举行了六（安）霍（山）起义，先后开辟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春，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指示将这三块革命根据地合并，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个地

---

① 李老末是一股武装土匪的头子。1928年前后，流窜在鄂豫皖边界山区，后死于罗田县薄刀峰。参见《麻城县委关于政治、军事、群众运动等情况的报告》，1929年6月5日。

② 武汉大学历史系欧阳植梁：《试论鄂豫边区的经济建设（初稿）》。

区的革命斗争。同年六月，鄂豫皖边区在光山县王湾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皖边特别区苏维埃政府。从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就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随着武装斗争的展开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军需、民食问题日益迫切地提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府面前。特别是如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物力、财力，支援革命战争，更是根据地财政工作的一项头等重要任务。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根据地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方法敛财聚物，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根据地创建初期，鄂豫皖边区主要是组织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抗税、抗粮、抗捐的“五抗”斗争，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摧毁旧的捐税制度，为建立新的税收制度奠定基础。军政人员的供给，除战争缴获外，全靠红军、赤卫队“向豪绅大小反动派最殷实之家罚款筹〔集〕。”做到取之于敌，用之于己。

根据地巩固、发展起来以后，单靠打土豪筹款已经不能满足军民日益增长的物资需要。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党和政府开始注意运用财政、税收杠杆，调节各阶级收入，按照土地革命总路线的要求，把负担的大头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对不同阶级，分别采取没收、征发、捐款、征税等办法，获取财政收入，并把重点放在税收方面。于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鄂豫皖边特委发布了《关于征收农业税问题的通告》，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第二号通令，宣布各级税务机关正式成立。同年十月，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商业累进税之规定》，明确税收基本原则是：“对于工人、贫民和城市贫民不抽税，对于有钱的却是资产愈大所抽的税愈重”。这同国民党政府和旧的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各级税务机关的建立和税收的原则规定，不仅保证了税收对游击战的供给，而且适应了运动战的需要，有力地支持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胜利发展。

一九三一年五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宣布成立。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又胜利诞生。在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的指挥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六月，连续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四大战役，歼敌近六万人，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进入全盛时期，总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五十万，有二十六个县，即：黄安、麻城、黄冈、陂安南、河口、陂孝北、罗山、光山、潢川、赤城（商城北面地区）、赤南、固始、信阳、六安、霍山、霍丘、红山（英山）、罗田、浠水、黄梅、广济、五星（霍山西部燕子河地区）、太湖、宿松、潜山、舒城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sup>①</sup>。其中还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广济（当时在枚川镇）等六座县城。

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遭到了暂时的挫折，进入了两年保卫、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向西转移，红二十五军又奉命北上抗日。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队乘虚而入，不断地对根据地进行“追剿”、“围剿”、“驻剿”、“清剿”，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红二十八军奉命重新建立，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各地财政税务人员也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不得不化整为零，参加到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中去，配合红二十八军，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负责筹粮筹款工作。群众称便衣队是“不挂牌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不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筹粮筹款，保障了军政人员的物资供给，而且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大别山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千山万壑之中。

纵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

---

<sup>①</sup>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

由于有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坚强领导，以及财政战线上全体同志的辛勤努力，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取得了很大成绩，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其中虽然也有一些错误，但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经验。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根据地的财政工作随着战争的胜利、政权的建立、生产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不断地得到加强和提高，在根据地全盛时期尤为明显。

一、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财政工作。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长江局给黄麻特委的指示信中也指出：

“中国革命已进到土地革命阶段，本党的任务就是把土地革命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的主要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鄂豫皖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如何围绕土地革命这场伟大斗争，充分发挥财政工作的职能作用，为巩固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服务，是摆在根据地人民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一九二八年，根据地的党组织根据省委常委通过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决议案》，把打土豪分配土地和筹粮、筹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采用暴力手段，把负担加在封建剥削者身上，把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和粮食作为军需民用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在实行农业累进税政策上，对雇农、贫农和牺牲的红军家属给予照顾，完全免税；对中农除去全年生活必需的供给以外，有剩余的即照章纳税；对富农除掉全家每人三石粮食外，其余按税则加百分之五征收<sup>①</sup>。这就不仅激励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九三一年获得了大大的丰收，并在以后几年连续赢得了好收成，而且使边区人民进一步认识到，要想保卫翻身果实，就要继续跟着共产党

---

① 《鄂豫边特委关于征收累税问题的通告》，1930年9月17日。

闹革命，维护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从此，一个踊跃纳税支援革命战争、积极参军参战的热潮，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泛掀起来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工作才有了扎实的根基。

二、大力发展经济，培养财源。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即使是在战争环境中，仍然注意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理财的根本。一九三一年二月，鄂豫皖特委作出了“生产要切实发展”的决议；特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向全区人民发出了“不荒芜一寸土地”的号召，发动妇女、儿童用尽可能的力量参加种田，进行生产比赛，开展生产运动。各级苏维埃政府拨出一批又一批的农业贷款，帮助农民兴修水利，植树护林，设立种子、耕牛调剂站，使农业生产不仅迅速得到恢复，而且在大部分地区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扶持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根据地党和政府还注意大力发展工业。既发展以生产军需品为主的国营工业，又积极恢复和兴办各种形式的集体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为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为了开展贸易和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的发展，打破敌人的封锁，保障军民的物资供给，根据地还创办了数以百计的经济公社和合作社。经济公社属于国营，合作社由农民联合经营。同时，对私营商业采取了保护政策，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规定，每日营业额不到一百五十元者完全免税，凡粮、棉、布、药材等类物资输入苏维埃地区也一律免税<sup>①</sup>，从而使根据地经济逐渐恢复和繁荣起来，财源相应扩大，财政收入情况良好。一九三一年五月，皖西北特区苏维埃政府给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报告说：“我们的累进税已普遍实行了，共收大洋一千二百元，收下地可收三千元之谱”。在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左”倾政策的干扰，也曾走过一段弯路，主要是盲目实行“土地国有”，大办集体农场，加之对中小商业也进行限制打击，致使人心浮动，农业

---

① 《鄂豫皖苏政府关于商业累进税之规定》，1931年10月。

一度减产，商业日渐萧条。一九三一年，鄂豫皖特委发现这些问题，立即予以纠正，这样才使根据地的经济得以复苏，财政经济状况也逐步好转。

三、制定预、决算制度，实行统一管理。土地革命初期，鄂豫边、豫东南、皖西这三块革命根据地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反映在财政收支上，自然也不例外。一九三〇年，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和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先后建立起来以后，很快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实行财政统一管理。一九三一年七月，各级苏维埃政府遵照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先后建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设财政经济委员，负责管理所属地区的财政工作。同年八月，鄂豫皖区财政经济委员会还为整顿财政问题发出了通令，要求各地实行统一和集中的原则，把财政上的权力集中到特苏财委会，一切国家税收，概由国家财政机关依照政府颁布的税则征收，按时上解，统一支配；清算以前的帐目，县、区、乡由上级派员协同群众选举的清算委员会分别进行清算；考查实际需要，制订新的预算，逐级上报审批；培养工农干部并改进簿记方式。贯彻落实这些决议和通令，根据地的财政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对促进发展边区经济，保障军政人员供给，发挥了巨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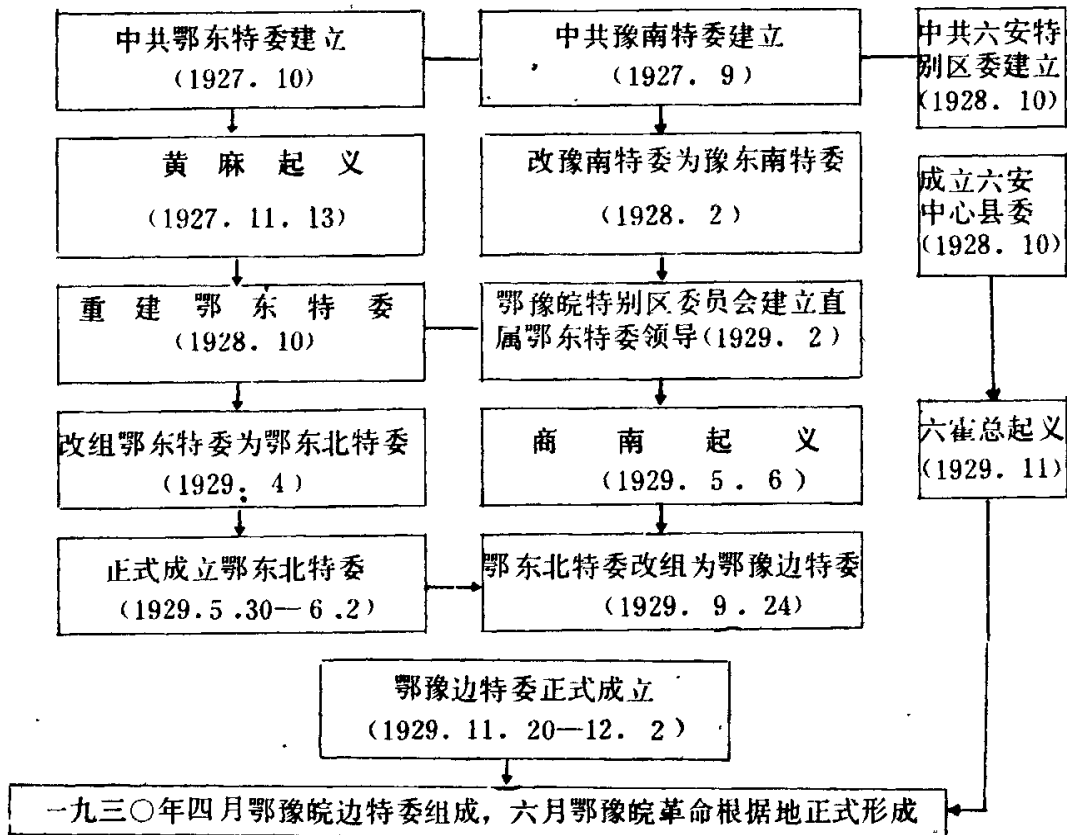
四、厉行节约，严肃财经纪律。根据地党和政府为了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始终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一九二九年，鄂豫边各县联席会议就号召各级苏维埃开展节约运动，刻苦自己，节省资金和粮食，接济群众，供给前线革命战士。当时，红军实行的是最低标准供给制，“一般每人（每月）三吊钱（即三千文铜辅币），最高时发过两枚银元”<sup>①</sup>，县、区、乡、村脱产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还要低于红军，尽量节省钱粮，以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如果

---

<sup>①</sup> 陈九：《回忆潜山革命委员会》（1930年2月—1930年9月）

##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共党组织发展变化示意图

(1927年8月——1937年7月)



(接下页)



(接上页)

